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

政治经济学研究

POLITICAL ECONOMY

中国经济新常态：动力、结构与制度
(2016)

总第17卷

王振中 胡家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

政治经济学研究

POLITICAL ECONOMY

中国经济新常态：动力、结构与制度
(2016)

总第17卷

王振中 胡家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6: 总第 17 卷: 中国经济新常态: 动力、结构与制度/王振中, 胡家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161 - 8014 - 3

I. ①政…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2016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73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10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政治经济学研究》学术委员会名单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秋石	王 询	王振中	任太增
纪玉山	宋冬林	杨 军	张桂文	邹 薇
周 冰	武建奇	赵学增	胡家勇	钱 津
焦方义	裴小革	蔡继明	樊 明	

编 辑 部：陈雪娟 武 鹏

目 录

第一篇 一般理论探讨

景维民 倪 沙	适应新常态 重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3
任保平 郭 晗	新常态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转型 与改革取向选择 ·····	14
樊 明	经济增长：数据及政治经济学分析 ·····	29
魏 枫	新常态下的技术进步视角解读 ·····	43
卜振兴	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争议与共识 ·····	55
刘 洋 纪玉山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 ·····	75

第二篇 增长动力转换

周云波 陈 岑 田 柳	外资流入对我国企业间工资 差异的影响研究 ·····	91
毛中根 孙 豪 叶 胥	消费主导型大国：特征、测度及政策·····	117
宋 建 臧旭恒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及居民消费对策研究·····	136
程承坪 张 蒂	中国经济的八大增长潜力·····	157
韩 鹏	产业集群对循环经济的影响研究·····	171

第三篇 结构调整

丁任重 陈姝兴	大区域协调：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趋向分析 ——兼论区域经济政策“碎片化”现象 ·····	185
王树春 王 俊	论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和制度匹配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新工业革命联动视角·····	201

江永基	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劳动力配置 ——基于比较利益相等的理论解释·····	217
乔俊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研究·····	232
段学慧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病”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245
张明龙	张琼妮 运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研究·····	259
吴丰华	白永秀 中国城乡社会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及应用·····	269

第四篇 提升制度质量

蔡继明	高 宏 “土改”试点:既要依法,又要深化 ·····	289
邹 薇	刘红艺 土地财政“饮鸩止渴”了吗? ——基于中国地级市的时空动态空间面板分析·····	298
张作云	公有制主体地位及其质和量的规定性·····	328
陈 健	市场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	348
贾后明	黄程程 论农村土地确权中土地权利的界定·····	361
杜兴洋	裴云鹤 政策网络视阈下的户籍制度政策变迁透析·····	372

第五篇 基本理论研究

郭冠清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基础的解读 ···	391
陈雪娟	《21 世纪资本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5 年美国经济学会年前后相关研究综述 ·····	403

附 录

胡家勇	卢新波 胡亦琴 中国经济新常态: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 十七届年会综述·····	419
-----	---	-----

第一篇

一般理论探讨

适应新常态 重构中国现代 国家治理模式

景维民 倪 沙

内容提要：中国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变迁总体上呈现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转型过程中，中国要以科学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协调与构建，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这是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新常态 重构 国家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模式可以被界定为在一定领土范围之内，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各自都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子制度系统，它们共同维系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促进并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了适应新常态，中国整体治理结构要实现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的三重转变，最终使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从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当前，以建立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中国需要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作者简介〕景维民，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倪沙，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一 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内涵及其实质

对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内涵学术界无一致界定。有的从政治学角度，有的从社会学角度，但都可以概括地将其看作在一个既定范围内维系秩序运转的所有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着眼，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相互协调，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全面、均衡发展，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① 因此，将国家治理模式定义为在一定领土范围之内，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其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各自都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它们共同维系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表 1 为国家治理模式制度构成及内在关系。

表 1 国家治理模式制度构成及内在关系

国家治理目标	国家治理手段	国家治理涉及的行为主体	国家治理模式的宏观制度结构
形成一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实现的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结构： $Y=O(G, M, C)F(r, l, k, a, \dots)$	维系国家秩序的一整套相互协调的正式（外在）制度（如宪法、普通法、政府指令、市场上的正式合约安排等）和非正式（内在）制度（如惯例、习俗、传统、文化等） 作用方式：相互协调	主体：政治行为主体，如政治家、官僚等；市场行为主体，如个人、企业、中间性组织；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如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等；外部行为主体，如外国政府、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等 行为方式：互动博弈	政府（G）：强制性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 市场（M）：基于自利性交易基础上的自发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包括家庭、企业以及中间性组织等市场主体） 公民社会（C）：具备非官方性、独立性和自愿性的民间组织，以及蕴含在这些组织网络内部的“社会资本” 结合方式：互惠共生与多元结构模式

①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5 页。

与以往概念相比,本文对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和综合的分析视角。它不再将政府与市场看作两种非此即彼、相互替代的协调机制,而是更加强调二者的相互增进与互惠共生的关系,即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个有能力政府的培育和扶持,而市场的繁荣同样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国家治理还引入了维系公共秩序与促进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维度——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可以同时缓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公民社会所孕育的社会资本则可以发挥增进信任、消弭利益分歧的社会黏合剂功能。

分析表明,国家治理模式的实质在于理解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借助一个经过简单修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表示:

$$Y = O(G, M, C)F(r, l, k, a, \dots)$$

其中, Y 表示一国的总产出; F 为生产函数, r 、 l 、 k 、 a 分别表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G 、 M 、 C 分别表示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大制度系统及治理手段,它们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国家治理秩序(O)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类似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它们共同推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从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二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面临的考验与挑战

2007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2009年迅速扩散,并进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各国采取了各种金融援助计划、经济刺激方案应对挑战,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还是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2%,其中高收入国家为-3.3%,发展中国家为1.2%。中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在:(1)保持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低等比较优势开始减少,技术和结构升级压力日益增加,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更为紧迫,潜在经济增长率走向下降。(2)深化改革阻力增大。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涉及的利益越复杂,碰到的阻力越大,社会矛盾不断显

现。(3) 扩大开放风险更大。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大竞争,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家经济安全提上议事日程。(4) 资源环境制约趋紧,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5) 维稳任务艰巨。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严重。(6) 考验民族总体素质。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以 2007 年为标志被学界称为新常态。

为了适应新常态,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内核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政府正从全能型政府转向强政府。强政府的内核在于政府具备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能够在矛盾尖锐复杂的转型期有效地掌控社会秩序,应对内外挑战,组织与动员社会资源,实现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目标。^① 强政府能力的形成源于如下因素:(1) 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了国家制度的整合度与协调性,避免了激进变革导致的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无序;(2) 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既维系了中央政府的必要权威,确保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3) 持续不断的政府体制改革优化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更新了官僚系统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也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理性化、制度化^②;(4) 政府在学习、试验、危机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不断更新治理理念,积累制度知识,提高自身驾驭市场和治理社会的能力。强政府的形成划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其次,混合型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混合型经济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公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是涉及更加广泛的层面,如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等诸多领域。^③ 中国混合型经济主要特征体现在:(1) 虽然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很高,但非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特别是由于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在公用事业、重工业、金融部门中,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2) 虽然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开放程度仍比其他国家低,如

① 马德普:《渐进性、自主性和强政府——分析中国改革模式的政治视角》,参见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1 页。

② 从 1982 年至今,中国一共进行了六次主要的政府改革:1982—1985 年、1988 年、1993 年、1998 年、2003 年、2008 年。几乎平均五年一次的频繁改革在转型国家中绝无仅有,它充分反映出政府改革在历任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偏好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③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3）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债券、股票和银行市场；（4）政府与私人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仍然主导市场的运行，并实施广泛的调节和干预；（5）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所有这些导致中国实现了混合经济结构优化。

最后，弹性社会的稳定器作用不断加强。这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质，而且与政府治理社会能力具有密切关联。其一，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得到不断推进，但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绝对优势。当农村人口占据多数时，社会在应对外部经济冲击时的弹性较大，因为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最大的是城市部门（如制造业、服务业凋敝产生的失业）。尽管在失业人群中农民工占据多数，但他们依然可以返回自己的乡土，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其他小型的工业、服务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危机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其二，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民众的理性化程度也得到很大提高，人们能够理解经济的周期性或偶然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从而更加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①其三，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处理危机及矛盾的经验更加丰富，技巧更为娴熟。政府不仅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确保增长和民生，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来引导民众的危机心理，重建信心。2008年年末，中央政府做出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未改变；危机给中国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带来了重要机遇。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等应对危机的“中国主张”。^②除在国际上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联手应对危机挑战外，中国政府在国内还利用特定组织和制度优势扶持社会发展，重建社会信心，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面对新常态的不期而至，中国治理模式的不足和缺陷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1）强政府悖论制约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改进和提升。中国治理模

^① 参见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新华文摘》2009年第12期；《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

^② 《迎战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答卷”》，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0/0105/08/5S8J3N4U000120GU.html>。

式并非完美无缺。虽然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政府的目标、体制、行为、功能等领域仍然存在许多不适应甚至阻碍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一些领域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过度扩张,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又存在政府职能缺失的现象,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强政府悖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改进和提升。

(2) 市场经济模式调整过程中仍面临新自由主义陷阱。全球经济危机充分暴露出以“无为政府+大私有化+自由市场+金融创新+全球化”为核心的放任型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这种市场经济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的今天也显得十分脆弱。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依然存在着极大市场,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争论依然存在,关于建立何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中国需要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3) 利益结构失衡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均衡,社会利益的分化重组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社会整体的利益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提高,但利益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却并不均衡。一些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另一些群体则成为失利者。这种状况不仅会对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带来风险和阻力,而且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障碍。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再一次暴露出社会利益失衡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分配差异、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都是导致内需不足的深层社会根源。而危机产生的失业、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等问题将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长期不利影响。因此,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失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两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将使中国未来转型与治理的风险增大。

总之,在新常态下,重建、变革、调整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主旋律,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显然处于这一变革进程的前沿地带。面对内外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走向持久繁荣的根本之道在于发展与提升中国治理模式,使之成为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三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战略选择

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要立足于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保持制度环境

的基本稳定,具体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这既是中国30年转型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相比取得优良转型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它是保持国家组织制度统一,确保政府具备充分行为能力,并保证社会经济转型坚持公正与繁荣目标的基本条件。另一个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发展这一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资源稀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仍然是制约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着眼于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并且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任何背离稳定与发展的激进变革都是不可取的。在坚持上述两大基本前提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协调与构建,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一) 化解政府悖论,建立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道格拉斯·C. 诺思有一个著名论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①这一论断被称为“国家悖论”或“政府悖论”。换言之,政府既可能成为维系国家秩序和谐治理、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扶持之手”;也可能成为干扰国家秩序、抑制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来化解“政府悖论”,成为贯穿人类社会兴衰发展史中的核心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处于变革进程中的中国。在前一阶段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比较有效地发挥了创建市场与整合社会的“扶持之手”的功能,但是,在政府的目标、体制、行为、功能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适应甚至阻碍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政府悖论”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单纯强调经济效率和经济利益,而忽视本应发挥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不仅导致烦琐的行政审批制度,增加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而且也滋生日益严重的寻租、腐败问题;(3)某些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导致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制度化,削弱了政府决策的有效性;(4)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和部门设置不合理,导致政府职能重叠、权责不清、政出多门等问题,降低了政府的治理效能,

^①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等等。^① 为了化解“政府悖论”，克服各种潜在的“政府失灵”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制度改革，建立起一种“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法治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一种制度安排。经验研究表明，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密切，法治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明显的正向效应。法治既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政府官员和公民都要遵循法律的约束。^② 建立法治政府的努力是中国政府转型中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成为促进法治形成重要的内部和外部动力。尽管转型过程中，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突出成就，但是政府的法治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在转型深化阶段，除进一步加强法律体系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经济结构优化等综合性措施来强化政府的法治意识与有效实施法律的能力。^③ 在提高政府法治化水平的同时，中国还需要通过更为深入的政府改革来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强调“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④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一个核心攻坚阶段，它将实现政府治理理念、政府职能和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它要求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界定自身的职能范围，合理设置政府的组织机构，完善政府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配置政府掌控的社会经济资源，在此基础上着力培育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能力，使政府的能力与其职能范围相互适应，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二）创建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好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能够促进社会长期繁荣的有效市场

① 董方军、王军：《大部门体制改革：背景、意义、难点及若干设想》，《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2期。

②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③ 俞可平主编：《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174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7-10-24/205814157376.shtml>。

经济体制。在转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结构已经得到初步确立，市场机制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依然存在许多制度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需要加以克服。虽然在转型深化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要更多地依靠激发社会民众的自主性与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但是单纯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自发作用显然无法完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由于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单纯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必然会导致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而且某些非法的私人部门也将会介入制度的创设，这时必然会产生大量无效的制度安排甚至滋生出种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从而干扰人们正常的理性预期，导致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泛滥，使整个市场陷入“低水平制度陷阱”之中。^① 因此，需要在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政府培育市场、增进市场的功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力克服政府缺位和政府越位并存问题，形成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的混合经济体制。

就中国而言，转型深化阶段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发挥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首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建设。在这方面，一些政府职能需要强化，另一些政府职能则需要精简。需要强化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加强有关支持公平竞争和促进良好经济秩序形成的立法及执法工作，提供必要的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市场的有效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与法律环境；需要精简的政府职能主要表现为改革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打破部门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必要的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其次，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关键性的经济制度改革与建设，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综合运行绩效。主要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和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完善商品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和规范其内在运行机制，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外贸、汇率体制改革，提高本国市场经济抵

^① 保罗·G·黑尔：《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